

宮崎市定論文選集

下 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馆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

下 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5年·北京

内部读物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

下卷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11017·253

1965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0千字
印张 10 ^{8/16}	印数 1—1,800册
定价(9) 1.30元	

目 录

世界史序说	3
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	34
东亚的近代化	69
东洋史上的日本	131
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	180
历史与盐	218
《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序言	231
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	236
合本组织的发展	
——“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补遗——	252
南宋政治史概说	255
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	283
中国文化的本质	302
《亚细亚史研究》第一卷序言	314
《亚细亚史研究》第二卷序言	319
《亚细亚史研究》第三卷序言	324

世界史序說

一、历史学应有的态度

希望正确地了解过去,或多或少地预测未来,把现在传流给后世,如果说这三者是人类的本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历史学是生根于人类的本能的学问。

精确地预见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接近于不可能的事。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些预见线索的,只是过去的事迹和现在的状况。对角力内行的人,为了预测势均力敌的一对角力者谁胜谁负,基础材料是前场比赛的成绩、其后的练习情况和现在的健康状况等等。然而所谓现在,可以说是沒有厚度的时间,它总是要逐渐转入过去中去,所以,我们一般常识上所说的现在,实际上是属于过去的。能够上升到我们认识之内的,都是已成既往的过去的事物。所谓现在,指的只是在过去之中比较新的部分而已。因此,我们应该说对预测未来所提供的材料,实际上都是过去的事物。

为了要预测在未来的角力比赛中谁胜谁负,对每一个角力者过去的比赛成绩、角力技巧、斗争气势和练习情况等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其总的战斗力,这样对角力内行的人,可以说是个优秀的历史家。尽管他处理的范围极有限,追溯过去的时间很短,想要预测的只不过是关于胜负这一个方面的事,但无论是对角力、棒球或是赛马的内行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正在从事一项了不起的历史学的工作。如果对于整个世界的动向,也有持有这种程度的忠实态度的历史家,那么,我们该感到多么欣慰啊!

一提到历史学,就被人认为好像是一种跟现在沒有关系、专心

致力于探索过去很久的事实的特殊的专门学问。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情况恰恰完全是这样。然而这本来不是对历史学应有的态度。历史学是探索整个过去的学问,历史学处理的所谓过去,应该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东西。事实上古时的历史学家们很多都是力图一直把历史写到他自己当前的时代。无论是日本的《古事纪》或《日本书记》,无论是中国的《春秋》和《史记》,无论是希腊的修昔的底斯或罗马的波里比阿等等,都是这样。他们的想法恐怕都是以现在为中心,把现在逐渐伸延到古代的去。从这种把过去作为现在的衬托而加以利用的古代历史学,转变为以过去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晚近历史学,就历史学本身来说,确实是一种退步。然而,所以如此,也有其相应的理由,因此,历史学一方面丢失了应该丢失的东西,另一方面却获得了应该获得的东西,从而在不断地进步发展着。并且可以说,历史学这样的变质,是由于更广阔的社会的全方面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专业化倾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前面列举的古代历史著作,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毋宁说是一种记录更恰当些。遗留下这种记录的著者们,不是统治者的史官,就是当权者的亲信,他们处于既能对现实政治进谏忠言,又能对搜集资料非常方便的地位,把搜集来的材料加以整理排列,撰成独特的记录,传流于后世。这样的记录,以自己当前的时代为下限,是很自然的结果,而它的空间广度被局限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狭小范围之内,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缺陷。而且由于范围狭小,又必然地有使这种记录陷于自以为是、充满偏见、为自己辩护的危险。这就难以保证这种记录与其他记录之间不发生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之处。在这里就产生了要求要对更广范围的记录,如果可能的话,对全世界的记录加以综合研究,把它整理成为有系统的知

识；于是，近代的历史学便建立起来了。历史学家已经不再是直接的采访员，而变成了关在研究室里的编辑了。提供给历史学家的材料多半是事隔多年、陈旧古老的过去的死的记录。特别是由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尖锐对立，现有的活生生的材料，在保护机密的名义下，不许轻易向外部泄漏。因此，实际情况是，历史学家所期待的精确记录，除了已经过时的陈旧材料以外，越是精确的记录，就越无法得到手。

此外，还有使历史学处境困难的不利条件。历史学的空间领域日益扩大，势必要涉及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些记录虽然是陈腐过时了的，但却在不断地出现。而且这些记录多种多样，用各种语言写成。不用说要一一过目，就是只查一查目录，一个人也是办不到的。加之各种社会、各种事业和科学专业化的发达，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使用着特殊的术语、学术用语和惯用语，这些大都已超过了一般历史学家的理解能力。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学怎样才能成为综合整个人类过去的科学呢？

然而，历史学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却在尽着最大的努力。第一是分工。例如科学史之类，素来是委诸科学家来担任的。又如美术史、思想史、经济史之类，也各按专业实行分工，或者委诸专家来担任，或者历史学家本身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这里可能产生出这样一种疑问：既然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按不同部门独立出去了，最后作为纯粹历史学而留下的究竟是些什么呢？幸而史料跟物质不同，经过各种扣除后，还不至于成为空空如也的东西。交给各特殊部门专家之手的史料，经过他们整理之后，就变成比以前更容易处理的形式退转回来。这样退转回来的史料，要求人们从更高一级的立场加以综合。在这里就有了所谓一般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和权利了。历史学决不是由于好吃的部分都被各部门的专家

拿走了，只好单靠吃面包渣儿来维持生活的流浪人。

历史学的分工并不止于社会特殊部门的分工，还必须有一般历史学的分工。这样就发生了按地域的分工和按时代的分工。所谓按地域的分工，就是像西洋史、东洋史，或者中国史、印度史那样，大体限定某一地域而专攻这一范围内的历史；所谓按时代的分工，就是像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或者文艺复兴时代、拿破仑时代那样，局限于一定时期而进行集中研究的作法。现代史虽然是最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研究设施的不完备和技术上的困难，实际上几乎已被当今的历史学置于度外。而各国政府的情报机关、私营报社、通讯社等，正在无意识地代替执行着现代历史学的使命。

历史学的分工虽日趋精细、论证详审，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流于枝节、忘掉纲领的弊病。更进一步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的要求，便成为近来世界史所期望的了。老实说来，历史学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世界史。

对于世界史能否成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许多疑问，多半是从人们过分重视晚近历史学的分工方面，而忘掉了历史学本来就是从分工的这一武断性的角度提出的。例如，文化多元论或文化一元论的问题。其实，文化的起源，如果脱离人类的起源，是不可想像的。既然称之为人类，如果不设想在那里有某种文化存在，那是不可能的。说人类是以亚当和夏娃二人为始祖而繁殖出来的那种神话，现在已说不通了。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是成群地发生、成群地发展的。既然是群，那么就各个群来说，在各地区之间，他们自然是隔着若干距离而生活栖息的。由于人类的分布非常广，这一极端和那一极端之间的距离很大，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地球表面。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从最初就是一个群，由于互相交通往来、互相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交通

的难易，自然有许多小群分别固定在各地，从而发挥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这也是事实。如果过分重视个性，就成了文化多元论；如果轻视了个性，就会成为一元论。总之，这不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譬如过早地下结论，说什么汉武帝时张骞通使西域以后，东亚和西亚才发生联系，这是对记录的误解。拿常识来判断，也不能想像在那以前，东亚和西亚是完全隔绝的、各自毫无联系的存在。何况考古学已经告诉我们，例如根据彩色陶器的分布，已经证明了远在以前的石器时代，两者之间就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呢。美洲为哥伦布所发现，这无疑是个重大事件，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在美洲人同欧洲人、非洲人以至同亚洲人之间，在这以前完全没有交通往来，这是违背事实的。

再者，所谓文化的影响，并不一定总是像往清水里滴墨水使之变色那样传播开来的。人是具有智慧的动物，能够闻一知十，只要给以暗示，便能领悟奥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样的文化影响的形式：从进步的社会传播来酵母，就可以在后进的社会里酿造出美好的酒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的分量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当然，刺激的强弱和感受性的锐钝确是问题，但我们可以说，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每个场合及其当时的状况，换言之，即过去历史的总和。

归根结底，概括地观察起来，人类实际是一个群体。因而历史自始至终实际是一部世界的历史。世界史能否成立这样的问题并不成为问题。历史应有的面貌，只能是世界史。问题在于如何综合、如何简化那种由于历史年代的悠久和相隔距离的遥远而自然产生的无数小群的特殊形象，以便正确地掌握其全貌。

所谓数理上的正确程度，通常是就最小位的数字而言，但是实用上所要求的正确程度，却在于如何毫无错误地掌握住接近最大

位数字所表示的意义。就历史学而言,感知事实的大小,比起明晰的理论来更为重要。天秤不能称大象的重量。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有一种钝感、冷酷等的不良癖性。如果缺少这些,就不可能代替人类感知命运的重压,就不可能牢实掌握并描画出庞大得如此难以捕捉的世界史的图景。

二、地域和时代

为了研究历史学而把世界史分为若干地域,这是自然产生的方便之计。所谓方便决不是说可以胡搞乱搞。最方便的方法恐怕只有一个。所谓最方便,是指以颠扑不破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时而言的。同样,在时代的划分上也可以这样说。总之,世界史的体系首先需要依靠最合理的地域划分和时代划分来描绘出它的轮廓。

现在看来,把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即亚细亚史)和西洋史(即欧罗巴史)是很不够的。就是说,东洋史至少需要再分为二,即东亚史和西亚史。东亚史的中心是中国,西亚史的中心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在二者中间还有一个印度。印度虽是个巨大的社会,但由于它过去没处在世界交通大道上,在世界史上的作用并不那么大,所以为了方便,现在把它附属于西亚史内,不另设一项目。

西亚的中心接近欧洲,事实上西亚和欧洲这两个地域是在保持着最密切的交往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历史上,这两者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互相敌视、互相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但这种互相抗衡的对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刺激双方觉醒、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此相反,东亚的中心距离西亚的中心很远,由于相距遥远,政治上的往来几乎微不足道,一般说来,只有和平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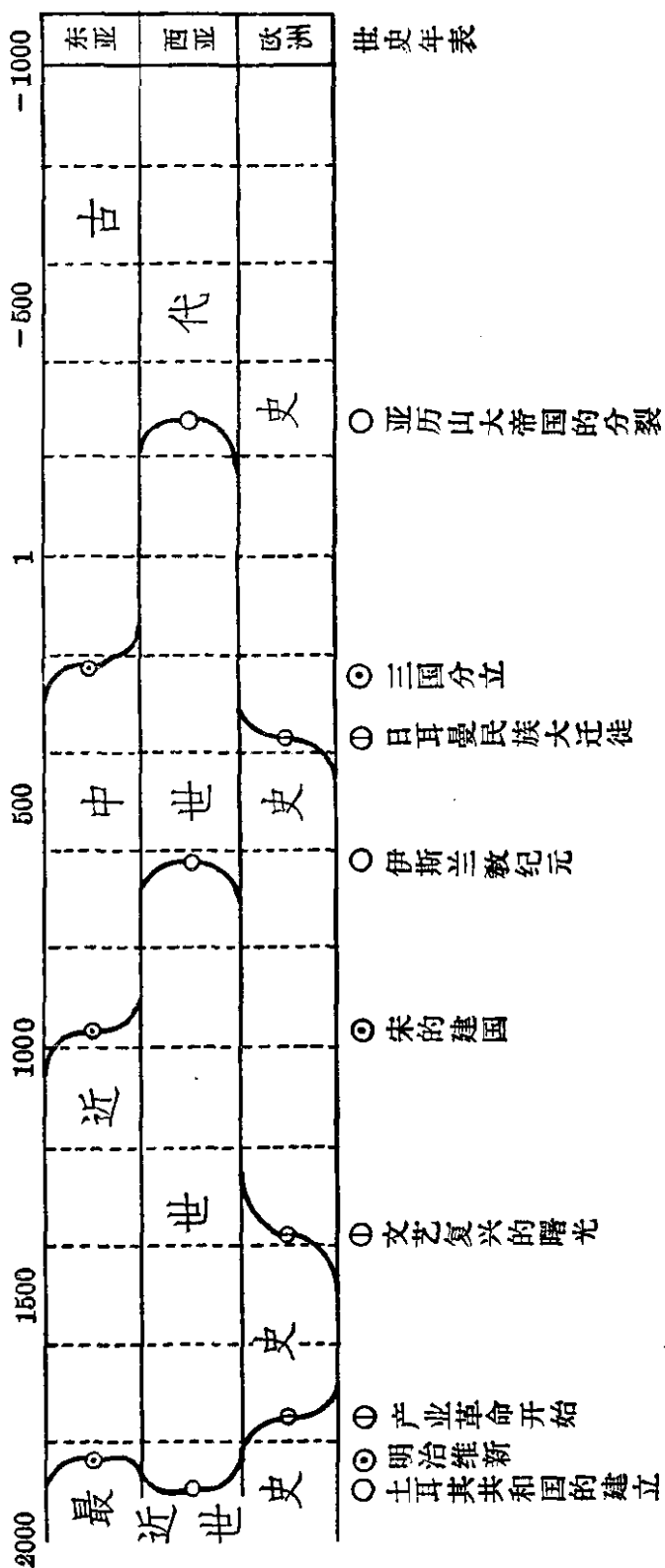
东亚和西亚的交通,主要是通过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新疆省)

天山南路沙漠之间而进行的。沿着散在大戈壁边缘的绿洲，以骆驼为唯一交通工具的商队的进军，乍一看来不免令人感到是慢腾腾的、效率很低的文化媒介者。然而，依靠这种艰苦的旅行所运输的东西，却是东亚、西亚两社会文化的精华，技术卓越的、价值高贵的工艺品。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在这条交通线上运送的物资总量，今天看来可能少得可怜，但是这条狭窄的通路却充分发挥了平衡两个社会文化水准的细长的吸管作用。

历史学上的地域划分，和地理学上的地域划分不同。由于在历史上存在着历史的时间，地域划分的境界是浮动的。有时西亚地域深深跨入欧洲地域，反过来欧洲地域有时也跨入西亚地域。现实的地球表面的形象决不是按照地理学家的方便而形成的；同样，历史事实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按照历史学家的方便发展的。

东亚、西亚和欧洲这三个地域，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自具有它的特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文字的写法上各自具有独特的特征。在东亚，文字是从上往下竖写，在西亚是从右往左横写，在欧洲则是从左往右横写。然而文字的这种写法也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所使然，不能因此提出这样的命题，即为了地域划分得以成立，文字的写法也必须各自不同。与此平行的，毋宁说是更重要、更根本的事实是，各个地域的发展大体上相类似，但在发展过程中，又各自具有一定程度的个性差异，而在这种个性差异的形成上，历史时间的交错是很大的主要原因。

作为掌握历史现象的方法，时代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划分时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归根到底，我想还是从来欧洲史上就使用的三个时代划分法最为方便。东亚、西亚、欧洲这三个小世界，迄今为止，都各自经历了古代史的发展、中世史的发展、近世史的发展这三个阶段。而各个时代的发展，在这三个世界里，决不是



在历学时间上平行进行的，而是互相错前错后，彼起此伏，参差不齐的。各地域文化发展所形成的个性，实际上多半是由世界的历学时间与历史时期的相对关系而产生的。这一点正是我所以把全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域的重要着眼点。

三、古代史的发展

历史学所能追溯的最古的文化，首先发祥于西亚地域。在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口的附近出现了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那是属于公元前三千年的远古的事情。大致与此同时，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有所谓古王朝的兴起。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究竟哪一个首先开放了文化之花，还不明确。不过，关于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两地之间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往返，它们是在互相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那就不必再深究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往东北走，在叙利亚地方出地中海，沿着海岸到达埃及的这一带土地，被称为所谓“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曾起过古代文化摇篮的作用。随着新月形的两端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繁荣，位于两地之间的叙利亚便成了交通的要冲，于是商业繁荣，大大小小的城市国家发达起来了。其中南海岸地方的西顿、推罗两城市所代表的腓尼基，除了经营陆上贸易之外，还经营海上贸易，终于远远在大西洋上活跃起来，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实。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逐渐地统一起来，成为阿卡德王萨良的王国，其领土远括叙利亚，达到地中海。从此以后，位居东西交通要冲的叙利亚就成了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与西方的埃及两个势力的角逐场所。在继承阿卡德版图的巴比伦王朝衰落的时候，埃及新王朝的势力急剧地扩张起来，占领了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岸驻屯军队，一时甚至侵入到巴比伦城。

接着，推翻了巴比伦王朝而兴起的亚述王国席卷了叙利亚，进而一时征服了埃及本土。由于统治着这样广大领土的王国的继起，许多古代城市国家逐渐被王国所吸收而失去其独立性。只有在叙利亚发展起来的的城市国家，虽然也陆续被囊括在大王国的领土之中，但直到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它的自主性，继续维持它的独自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

城市国家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国家形式。其特征可以列举如下：首先是它的领土比较狭小，从其中心至国境大概不超过一日的行程。其次是它的居民几乎全部聚居于领土的中心而形成城市。在城市的周围环筑城壁以防敌人侵袭，定居在城市外郊的人民极少。这样的城市是个完全的独立国家，以不隶属于任何其他

国家为原则。所以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集团地发生的。如果一个城市国家由于必要而获得了新领土时，就在那里建设跟本国同样的殖民城市，并和它缔结特殊的同盟关系，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古代文化实际上就是以这样的城市国家为温床而成长起来的。

关于世界上最初的国家群为什么采取了城市国家的形式一点，固然可以提出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里姑且不谈。要谈的只是在政治上独立的无数城市国家相互对立的形势，决不能原封不动地长久维持下去。由于利害冲突、互相嫉妒反目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使强国有可能逐渐把弱国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在同盟的名义下产生了统治与服从关系；这样就出现了称霸者，逐渐把权力集中起来。于是，有时是一个强国征服了其他国家，剥夺了它的独立性，建设起拥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有时是乘着城市国家群的纷争，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从外部侵入而形成一个大帝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总是分散的多数的主权逐渐被一个强有力的主权所吸收。多数城市国家的消灭，统治广阔版图的大领土国家的继起，是古代史发展的特征。

后出现的巴比伦帝国的领土比萨良王的阿卡德帝国大，继起的亚述帝国则更大。而最后出现的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完全吞并了埃及，囊括了小亚细亚，渡海到巴尔干半岛，把国境推进到欧洲，建立了前所未闻的拥有广大领土的帝国。

我把从城市国家的解体进展到大帝国的建设，从地方割据进展到大一统，叫做古代史的发展，这也许会引来一些非难，认为这岂非过分拘泥于事物的外部表象了。要知在历史学上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必然在它背后潜藏着与此相适应的理由。最初人类所以创设了城市国家，可能必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但对其当事

者来说,一定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样,对建设一个强大帝国也可以这样说。在沒有任何前例的地方建设起一个庞大帝国并加以统治,这是个相当巨大的事业,也是个伟大的发明。为了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另一方面必须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基础条件。总之,人的智慧如果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大的帝国是不会产生的,强大的帝国当然要依靠武力的征服才能产生。在对付外敌方面,武力必须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比敌人卓越;还必须组织得很好,才能在防御上和远征中充分发挥其机动性。为了维持一旦已经成立的大帝国,当然需要政治力量,但在统治的组织、法制、记录等技术之外,为了长期统治庞大的人民群众,一种能使任何人都承认的大帝国统治的理想还应该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的基础,归根结底是文化力量,这里既有质的问题,也有量的问题。为了拥有维持强大帝国所必需的相当多的知识阶层和领导阶层,就要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前提。就是说,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是在分配手段方面,必须达到相当高度的发展水平。而这样的经济力量,则有待于国内治安的维持、政治的安定和文化创造力的进步。总之,在一切方面如果所需要的条件不具备,要建设成一个强大帝国是不可能的。强大帝国决不是突如其来地偶然产生的,其广袤的大小是同人类智慧发展的高度成正比例的。从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直到波斯大帝国的出现,大约需要了两千五百年的岁月。

波斯大帝国的建成者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三代的大流士大王。他统治帝国的方法,为嗣后继起的诸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范。他把他的广大领土分为数十个行政区——郡(萨特拉庇伊),由国王任命的郡守(萨特拉普)来统治。郡守不掌兵权,而且不断地由中央派遣监察官对其政治进行监督。军队由国王直接掌握,分驻在各要冲,依靠布满全国的军用道路把它们紧密地联结起来,能

够迅速地调动兵力。军用道路的大干线,由国都苏萨起一直到小亚细亚的迈镇萨迪斯,都是用石头铺成的,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其间设有官家的驿站,据说普通需要三个月行程的全路程,紧急的邮递只需六天便可传达到。军用道路平时也可作为一般交通之用,对帝国内部的物资调动和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领土内的各个城市,虽然没有外交和军事权,但在内政上,却被允许实行高度的自治。特别是波斯人,允许领土内各民族信教自由。波斯人自己是信仰以琐罗亚斯德为祖师的所谓拜火教,但他们并没有强制异民族信奉它,而这种宗教是最早出现在世界史上的、最宽大而且旨在宣扬正义的宗教。

由大流士大王建立的古代波斯王朝,保持了延续二百年的繁荣之后,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王所灭。亚历山大无疑是兴起于希腊北方、出身于希腊种族的,但他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却是波斯王朝的继承者。在西亚的历史上,他以伊斯康大尔之名被列为正统王朝之一。他建都于西亚的古都巴比伦,统治了波斯的旧领土。但他的治世没有超过十年,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广大帝国就土崩瓦解了。从此以后,在西亚趋于大一统的倾向逆转过来,明显地呈现出分裂割据的倾向。我们应该把这个转折期看做是西亚古代史发展的终结和中世史发展的开始。和向心发展的古代史倾向相反,离心分裂的倾向正是中世史发展的最显著的特点。

同西亚地域相对立,不断反抗西亚而发展起来的欧罗巴地域,本来是从西亚地域分裂出来而产生的。完成这种分离独立的中心力量是古代希腊的城市国家群。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其最初的国家形式也是城市国家,而且这种城市国家,由于它邻接西亚地域的先进文明,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致使其城市国家的性格得以发展到无与伦比的高度。这就是古典希腊文明所以比其他地域的古代